

《汉学研究学刊》创刊号（2010）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1 (2010), 16-40

中国古籍互文的生态学分析

李国正 拉曼大学客座教授

王能杰 台北致理技术学院讲师

摘要

中国古籍互文有六种生态类型：语义重叠、语义互补、语义省略、语义综合、语义兼类和语义矛盾型。任何类型的互文，在不同的环境层次上，都具有不同的生态形式和结构关系。语句不但在句法结构上有层次性，语句所在的环境也有层次性。认知意向、文化因子对互文的语义及结构关系，在不同的环境层次上有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籍 互文 生态类型

导言

本文考察中国古籍互文的六种生态类型：语义重叠型、语义互补型、语义省略型、语义综合型、语义兼类型和语义矛盾型。任何类型的互文，在不同的环境层次上，都可能具有不同的生态形式和结构关系。传统语言学对于互文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语句环境或篇章环境层次上，这是不够的。人的认知意向、文化环境对互文的语义及语法结构关系，有不可忽视的诱导、制约作用。因此，语言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低层次环境或离开环境作纯形式化的考求。

古籍里所谓“互文”，也称为“互言”、“互辞”，或“互相足”、“互相备”、“互相明”、“互相见”、“互相成”等等。《仪礼·乡射礼》：“主人曰：‘请彻俎’。”唐贾公彦疏云：“凡言互文者，各举一事，一事自周是互文。”¹

“互文”是中国古籍注疏中运用的术语，通常指一个语句或语段中两个或多个语词在语义上相互重叠、相互补充，或相互提示的现象。本文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贾公彦所指“各举一事”的互文。为了表述的方便，文中引进了一些生态学概念。这些概念按照生态语言学理论重新加以界定，具有新的内涵。²生态语言学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自然语言以及任何语言元素、言语成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置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运动变化。因此，考察任何语言、语言元素或言语成份，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环境。语言、语言元素或言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008。

2 生态语言学理论是李国正于1987年把生态学基本原理与语言研究结合起来新创的交叉学科理论。详细内容参阅《语文导报》1987年第10期《生态语言系统说略》，以及《生态汉语学》。

语成份，在不同层次上与特定环境条件相互整合，决定了它们的存在形式。这种形式，称为生态形式。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简称生态。语言、语言元素或言语成份赖以生存的环境，称为生态环境，简称环境。语言、语言元素或言语成份赖以生存的必要环境条件，称为生态环境条件，简称生态条件。语言、语言元素或言语成份与特定生态环境条件整合生成的变体所构成的类型，称为生态类型。具有一定时空分布的语言或言语成份与一定环境条件整合，在一定生态环境中所占据的、有一定功能等级的时空位置与关系，称为生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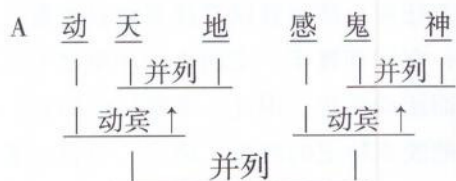
互文具有六种生态类型。

一 语义重叠型

《诗·大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孔颖达疏：“天地云动，鬼神云感，互言耳。”³

1、结构分析

在古汉语中，“动天地，感鬼神”可能有如下语法结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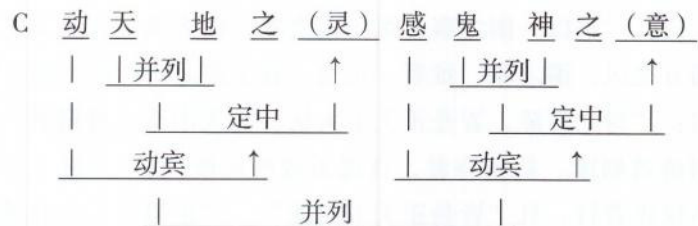


古汉语表被动的介词可以省略，若视此互文已省略表被动的介词或者动词为使动，就会有：

3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70。



古汉语定中结构的短语有时可以省略中心成份，如“乘坚策肥”是“乘坚车策肥马”的省略式。这样又可以分析为：



2、认知意向

既然此互文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结构模式，那就表明该语句可能涵盖多种语义，客观上也就为解读互文提供了多种意向选择的机会。孔颖达疏曰：“由诗为乐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变动天地之灵，感致鬼神之意，无有近于诗者。”⁴显然，孔颖达认为“天地”、“鬼神”分别是“天地之灵”、“鬼神之意”的省略式。但这只是适合互文生态形式的一种语义选择，它在逻辑上不能排除其它可能出现的语义选择。

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70。

3、语境分析

为此，有必要考察该互文所在的篇章生态环境。孔氏以为“正得失”即“正人得失之行”，这与《大序》通篇精神不符。其一，《大序》云：“先王以是（指诗——引者）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此句下孔疏曰：“美教化者，美谓使人服之而无厌也。若设言而民未尽从，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后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诗为之。”⁵可见诗之功用，不仅正行，而且正言。其二，《大序》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孔疏曰：“诗之所陈，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诗之道则兴，幽厉不用诗道则废。此雅诗者，言说王政所用废兴。”⁶进一步看，诗不仅正言行，且“皆是正天下大法”，“正得失”与其等同于“正人得失之行”，毋宁解为“言废兴”更切合篇章生态环境。“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形式一致，结构相同。把“正得失”视为“正人得失之行”的省略式既然与语境相扞格，则“动天地，感鬼神”解为“变动天地之灵，感致鬼神之意”也就纯属蛇足了。由于“正得失”为动宾结构关系，“动天地，感鬼神”在语句层次上结构关系与之保持对应，因之，B、C两种结构分析不适合互文所在的篇章生态环境。

4、组合关系

互文可以组合为：

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70。

6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72。

- A 感动天地鬼神
- B 动天地鬼神 感鬼神天地
- C 感动天地 感动鬼神

这三种组合都适合互文所在的篇章生态环境。

5、语义分析

《说文·心部》：“感，动人心也。从心咸声。”⁷孔疏：“故《乐记》云：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又曰，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⁸“感人”与“动己”前后并举，出现的语句环境相似，显而易见为同义结构，是“感”亦“动”也。则“感”与“动”在互文生态环境中也是同义并用。所谓“正得失”，“得”字衬音，偏义在“失”，“正”与“得”在语义逻辑上不能搭配。因之“正得失”犹言“正失”。孔疏：“《公羊传》说《春秋》功德云：‘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休云：‘莫近犹莫过之也’。”⁹则“莫近于诗”即“莫过于诗”。

6、文化分析

孔颖达疏：“《周礼》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与天地相对，唯谓人之鬼神耳。”¹⁰根据这样的传统观念，“天地”与“神祇”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若“鬼神”与“天地”相对并举，则其文化内涵也相近。所以孔疏云：“人君诚能用诗人之美道，听嘉乐之正音，使赏善伐恶之道，举无不当，则可使天

7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222。

8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70。

9 同上。

10 同上。

地效灵，鬼神降福。”¹¹这里的“天地”、“鬼神”实际上文化内涵已完全一致。不仅如此，“人曰鬼”，所谓鬼神亦人之鬼神。这样，人——鬼神——天地在传统文化观念体系里是可以互相转化、互相替代的概念。难怪孔疏云：“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¹²这种“天人感应”、“天地神鬼人一体化”的哲学观念，一直影响到后代。《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宋代邢昺疏云：“子路问事鬼神者，对则天曰神，人曰鬼；散则虽人亦曰神。”¹³因此，“天地”、“鬼神”、“人”尽管在语义上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在一定的言语生态环境中可以各自独立，相互区别，但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它们就可能因具备相同的文化内涵而突破原来语义的局限，在更高的层次上作为等义词运用。这样，从功能方面考察，互文中“动”与“感”，“天地”与“鬼神”分别是两对功能相同的言语成份，“动”与“感”在同一语句中都充当谓语，“天地”与“鬼神”都充当同位宾语。从生态语言学角度考察，“动”与“感”，“天地”与“鬼神”所占据的生态位分别相互重叠，在特定文化层次上分别只有一种语义与之对应。

二 语义互补型

这是中国古籍中最常见最具有代表性的互文类型。

1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70。

12 同上。

13 同上，页2498。“对”与“散”是宋代邢昺为《论语》作注所运用的术语。“对”指两个语词在同一语段运用时语义有相对应相比较相区别的关系；“散”指相对应的若干语词中其中一个语词独立运用的现象。

根据互补成份的语义联系，语义互补型互文包括类义互补、对义互补与反义互补三种次类型。

类义互补者，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与“汉”，都是朝代名称，语义相类，都充当中心词“明月”和“关”的定语。完整的语义是“秦汉时明月秦汉时关”。

对义互补者，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入”与“出”、“中”与“外”、白居易《琵琶行》“主人下马客在船”，“主人”与“客”、杜甫《潼关吏》“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大城”与“小城”、《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其中“雄兔”与“雌兔”，它们分别语义相对。

反义互补者，如《礼记·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郑玄注：“约与先互言耳。君子约则小人多矣，小人先则君子后矣。”¹⁴《易·坤卦·彖传》：“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之“参互”分析此例：“亡友曾运乾云：此言与同类行则无庆，不与同类行则有庆也。义与今之电学排同引异相似。而上二句但言其事，不言其吉否；下二句言其吉否，不言其事，所谓互文以见义也。”¹⁵“约”与“多”，“先”与“后”；“乃与类行”同“不与类行”，“乃终无庆”同“乃终有庆”，它们分别语义相反。应当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互文，在形式上往往只出现一对反义词中的一个语词，在语义上与它对立的另一语词要由认知意向逆推，不能仅

1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619。

15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04。

仅依据现成的言语材料生硬拼凑。如不能将“约”与“先”或“乃与类行”与“乃终有庆”互补。

上述三种次类型的互文，根据两部分语义逻辑所允许的组合方式的多少，每种次类型又可以划分为简式互补与复式互补两种情形。通常情况下，简式互补的互文前后两部分语义逻辑允许的组合方式较少，互补成份在新组合的语句中占有的生态位没有多大选择自由，因而语句生态形式较少，难以构成多个结构关系不同的语句。

复式互补则组合方式较多，可以构成多个结构关系不同的语句，占有的生态位相对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复式互补大都是类义互补，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将军”与“都护”都是军队成员，语义相类，在短语中都充当主语；“角弓不得控”、“铁衣冷难著”既是“将军”的谓语，也是“都护”的谓语。此例互文前后两部分的语词，逻辑允许还可以有三种组合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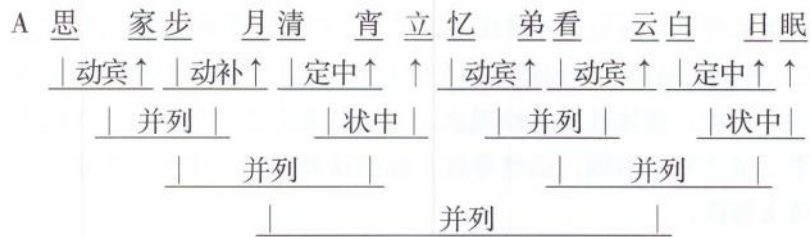
- A 将军铁衣冷难著 都护角弓不得控
- B 将军都护角弓不得控 都护将军铁衣冷难著
- C 将军、都护角弓不得控，铁衣冷难著

但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逻辑允许的多种组合方式并不一定都是诗歌表达的最佳方式。要确定最佳方式须得考察互文生态环境中的若干相关因素。

如杜甫《恨别》：“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1、结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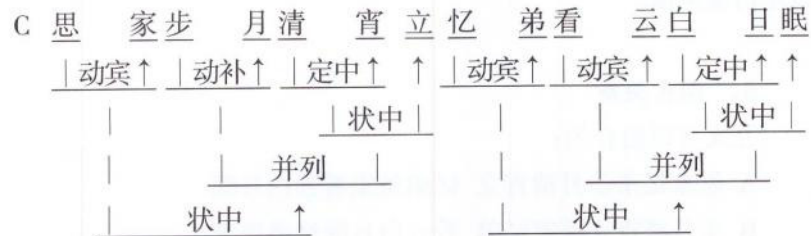
通常语法结构关系如A所示：



原句也可能是省略了因果关系连词的紧缩复句：“（因）思家（而）步月清宵立，（因）忆弟（而）看云白日眠”。则语法结构可分析为：



也可能是“思家（于）步月清宵立，忆弟（于）看云白日眠”省略了介词的状态语后置句：



2、认知意向

三种结构关系暗示解读文本不限于一种认知意向。通常按语法结构A得出的认知意向，是把前后两个分句作为相对独立的两种语义来理解，但是这样解读违反了互文的基本原则，因而A、B、C三种语法结构都必须排除两个分句各自独立的常规认知定势，树立互补性、整体性的思惟观念。然而，无论是并列关系，先因后果，抑或先果后因，必然导致不同的认知意向，由此产生不同的语义解读。

3、社会背景

杜甫在成都写这首诗时正值安史之乱，兵戈频仍，家山迢递，音问阻绝。安史之乱造成的思亲之切、离别之恨，不再是作者个人的遭际与恩怨，而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这就为语境分析提供了参考旨向。

4、语境分析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分别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点明安史之乱发生的范围之广，耗时之久；“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则将无自觉意识的草木与有意识情感的人相提并举，抒发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这就为进一步表达羁旅在外的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人的深切情怀，造成了胡骑长驱、兵戈阻绝、草木变衰、洛城阔别的特定语境氛围。

5、组合关系

互文可以组合为：

A 思家忆弟步月清宵立 忆弟思家看云白日眠

B 步月清宵立思家忆弟 看云白日眠忆弟思家

C 思家忆弟步月清宵立看云白日眠

6、语义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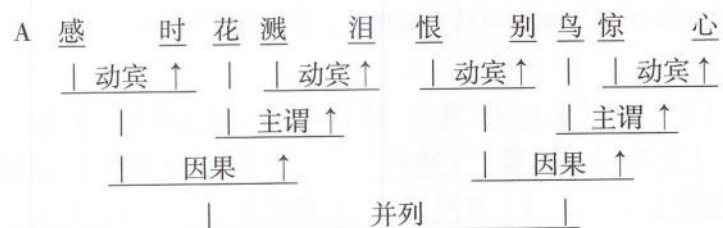
“思家”与“忆弟”语义相类，共同构成“思念亲人”这一语义核心。思亲之切由反常的特殊行为凸显出来：清宵本是睡眠的时间，但诗人却在月光下伫立徘徊；白日是劳作的时间，但诗人却望着天上的白云进入梦乡。作者以这两个典型的思亲画面涵盖了所有的生活场景，以鲜明精炼的形象，表达了诗人无时无地不在思念家人的深切情怀。因此，语义解读不应狭隘理解为只有“步月清宵立”“看云白日眠”才思亲；更不能误解为“步月清宵立”才思家，“看云白日眠”才忆弟。

复式互补型互文的互补成份在新组合的语句中相对有较多选择生态位的自由，因而在同一环境层次中同一互文可能具有多种语义和语法结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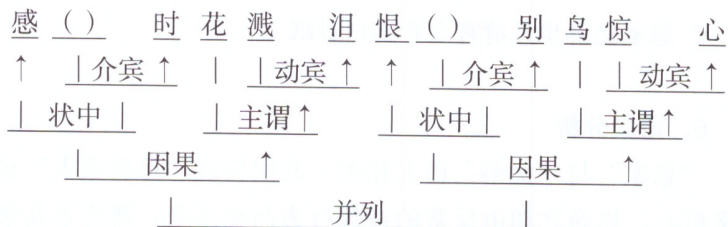
再看下例：

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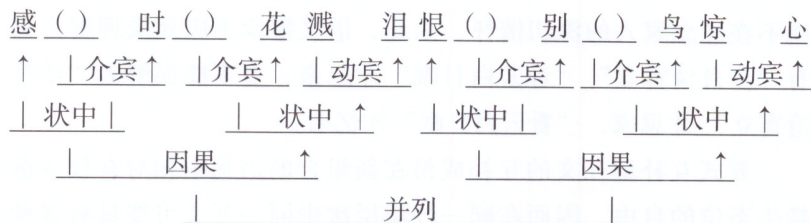
1、结构分析



B “感时”、“恨别”在古汉语中后置成份通常表原因，这样，“感时”、“恨别”就是“感于时”、“恨于别”的省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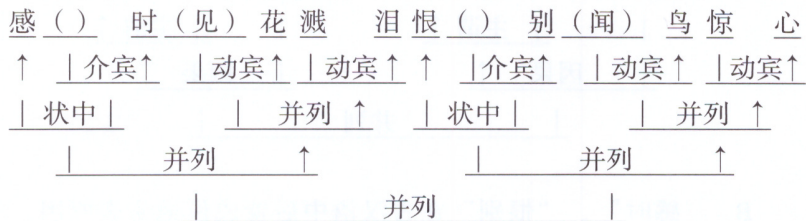


C 表使动，也可视为省略介词：



2、认知意向

司马光《续诗话》：“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春望》诗‘国破山河在’，明无余物矣；‘城春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如按司马光的理解，则有如下分析：



由于认知意向的不同，即使不增字，也还可能有另外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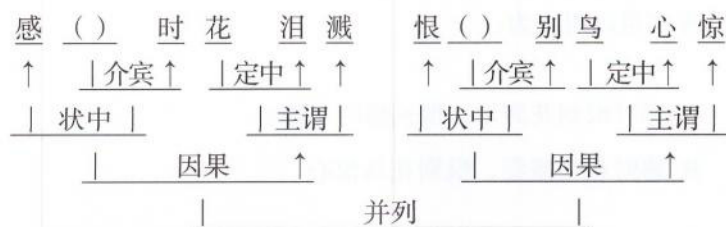
分析。

3、语境分析

汉语语句很难省略谓语动词，故司马光增字解诗不一定切合原诗意旨，因而有必要考察互文所在的篇章生态环境。首联出句“国破山河在”与颈联出句“烽火连三月”相呼应。国破之下，山河虽在，烽火不息，“感时”即对此而言。此情此景，即使花也溅泪，何况于人！首联对句“城春草木深”与颈联对句“家书抵万金”相呼应。“草木深”则人迹空，人迹空则家书贵，“恨别”即对此而言。人违讯绝，提心吊胆，即使鸟也心惊，何况于人！“花溅泪”、“鸟惊心”这种赋物以情的手法显然比直抒胸臆的“见花溅泪”、“闻鸟惊心”更见匠心。如取后者，则与司马光“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的见解相悖。

4、语义分析

《说文·心部》：“感，动人心也。”“恨，怨也。”《集韵》线韵：“溅，激也。”《广韵》庚韵：“惊，惧也。”这些词语的语义相互独立，在语句环境中各占一定生态位，不存在生态位重叠。“感”、“恨”、“溅”、“惊”在古汉语中均为不及物动词，“时”、“别”不是“感”、“恨”的对象或结果，而是原因。“泪”、“心”不是受事而是施事。因此互文的语义内涵暗示互文应是如下结构关系：



若依此分析，语义逻辑尚存扞格，鸟心即令可惊，花岂能有泪？

5、文化分析

这就得从文化环境作进一步的考察。赋物以情即今之拟人手法，在唐诗中已普遍运用。如李白《春思》“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古风》四十七“桃花开东园，含笑夸白日”，《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撼撼”；戴叔伦《江都故人偶集客舍》“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虫”；皇甫冉《春思》“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李商隐《早起》“莺花啼又笑，毕竟是谁春”，《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拟人手法在杜甫诗中也普遍运用，如《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吹角向月窟，苍山旌旆愁。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独酌成诗》“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绝句漫兴》之五“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乌鹊愁银汉，骖鸾怕锦幪”；《甘园》“青云羞叶密，白雪避花繁”。这样，“花溅泪”、“鸟惊心”人格化的结果排除了增字解为“见花溅泪”、“闻鸟惊心”的认知意向。

6、组合关系

互文可以组合为：

- A 感时恨别花溅泪，恨别感时鸟惊心
- B 感时花鸟溅泪，恨别花鸟惊心

C 感时花溅泪惊心，恨别鸟惊心溅泪

D 感时恨别花鸟溅泪惊心

其中D种组合虽然语义逻辑允许，但不适合互文所在的篇章生态环境。

可见复式互补型的互文前后两个部分在篇章生态环境中的组合方式较多，互补成份在新组合的各个语句中可以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因而可能造成不同结构关系的多种语句生态形式。

三 语义省略型

省略通常以默契为前提，古代典籍里互文语句成份的省略在当时必定具有较强的社会默契性，否则人们就无法读懂这类互文。对后代而言，这类省略了语句成份的互文客观上造成了解读的困难。如《左传·襄公四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

社会意识的默契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缺乏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常识的读者，只凭文字表层意义无法正确破译这段文字的真谛。这就须要进行文化分析。孔颖达在这段文字后疏曰：“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于《肆夏》先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于《文王》已言工歌，《鹿鸣》又略不言工，互见以从省耳。”¹⁶ 由孔颖达的解释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奏乐配歌是诸侯会宴宾客的一种礼节。晋侯宴穆叔，作乐先言金奏，事实上用金属乐器奏乐是同乐工歌诵同步进行的。因此，先言“金奏”，省略了

16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931。

“工歌”；次言“工歌”，省略了“金奏”；再次言“歌”，既省略了“金奏”，又省略了“工”。

中国古代礼制，现代人知之甚少，这就需要参考古代学者的注释，否则很难正确破识互文语义。如《礼记·丧大记》：“小臣复，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郑玄注：“君以卷，谓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则夫人用祔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孔颖达疏曰：“男子举上公，妇人举子男之妻。男子举上以见下，妇人举下以见上，是互言也。”孔疏又曰：“君以卷者，谓上公以衮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者，谓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¹⁷由此可见，“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前部分省略了“君夫人用祔衣”；后部分省略了“子男以毳”。如果不明白周代丧礼对不同爵位品级的有关规定，根本就不会知道这是语义省略型互文，更不会知道省略的具体内容。

由此可见，考察语义省略型互文的关键在于文化分析。不懂文化或文化错位，都会造成失读或误解。

四 语义综合型

互补是不同分句里位置相对应的语词的意义相互补充；综合是不同分句里位置相对应的语词的意义整合为一个新的语义。与通常认为互文是为了节省言语材料，以较少的文字表达较丰富内容的观点相反，语义综合型互文则是以较多的富于形式美感的文字，表达较少的需要突出的内容。

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中“物”与“己”不但指他人与自己，而且整合为涵盖他人和自己

17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572。

的所有人事环境；“喜”与“悲”也不仅指高兴或悲伤，二者整合为涵盖喜怒哀乐的一切情感。

《木兰诗》：“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东市”、“西市”、“南市”、“北市”不可孤立理解为“东边的市场”、“西边的市场”……，它们共同整合为一个新的语义：“所有的市场”。“骏马”、“鞍鞯”、“辔头”、“长鞭”，也整合为一个新的语义：“行李”。同时还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木兰是否还购买了其他诸如生活用品、武器装备等等。这一互文花费了不少文字，干脆直接说“到所有市场去买了许多行李”，不是更简洁明白，更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吗？

但《木兰诗》并非普通的社会交际言语，而是靠艺术魅力来感动人的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不仅具有普通社会交际言语的信息传播功能，更重要的是必须塑造生动的形象来凸现其美学功能。在经济性原则与价值性原则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文学文本往往不惜牺牲经济性原则而力求最大化展现自身的审美价值，从而获得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这就是文学文本中的语义综合型互文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东市”、“西市”、“南市”、“北市”、“骏马”、“鞍鞯”、“辔头”、“长鞭”，乍一看似乎很不精炼，但是它们构成了有规律的节奏，造成了言语形式整齐对称的格局，既有形式美，又有音律美，这就不是两句经济性很强但毫无美感的大白话所能比拟的了。

语义综合型互文中像这类具有审美价值的语词，就是言语在文学文本环境中的羡美生态，也就是在特定文学环境中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社会主体的审美条件与一定文本的言语成份的整合。¹⁸它是文学言语功能达到一个高级层次的表征。

18 李国正，《生态汉语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页497。

五 语义兼类型

所谓兼类，是指构成互文的成份在语义上兼有两种类型的特征。

《木兰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仅从本语句的语义内容来看，“将军”、“壮士”都是对人的不同称谓，语义不同。但在篇章生态环境中，却同指木兰。这两个词语的语义在特定环境中发生重叠，“将军”就是“壮士”，“壮士”亦即“将军”，这是语义重叠型互文的特征。“百战死”与“十年归”在语义上相互补充。如果脱离篇章环境，一般会认为“死”是“百战”的结果补语，可是结合全诗语境考察，“死”实际上是行为状语后置。如果将军真的战死，壮士何以得归？“百”和“十”都是虚数，

意为无数次拼死作战，多年之后回到家乡，这是语义互补型互文的特征。

杜牧《早雁》：“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脱离互文看，“仙掌”是“仙人掌”的缩略语，“长门”即“高门”。如联系社会历史背景考察，“仙掌”指汉朝建章宫里手承露盘的铜仙人，“长门”指汉朝陈皇后失宠后居住的长门宫。这两个词语在诗篇生态环境中都不是特指，而是“汉宫”的同义词，因此，本来语义各自独立的两个词语，在特定生态环境内，语义却发生重叠。“月明”与“灯暗”既互相补充，又相互映衬，因月明而显得灯暗，以灯暗反衬月明。“孤影过”与“数声来”既互相补充，又相互联系，因影孤故叫声少，以叫声少衬雁之孤。可见此互文兼有重叠与互补两种类型的特征。

杜牧《阿房宫赋》：“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取掠其人，倚叠如山。”其中前三个分句里的“燕、赵”，“韩、魏”，“齐、楚”并非特指某两个具体的国家，而是泛指战国时期除秦国以外的任何诸侯国。“燕、赵”，

“韩、魏”，“齐、楚”对举并不只表示当时东方的六个强国，三组国名交互为文是以强国涵盖弱国，以大国涵盖小国，一言以蔽之，即以具有代表性的六个国家的名称，概括战国时期除秦国以外的全部国家。可见三组国名已整合为一个新的语义。而“收藏”、“经营”与“精英”意义相互补充，同一语句包涵互补成分与综合成份，这是兼有两种类型特征的互文。

柳宗元《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叫嚣”与“隳突”意义相互补充，表现悍吏一面横冲直闯、一面大声叫骂的凶狠形象。而“东西”与“南北”就不是相互补充，因为“东西南北”并非表示四个方向，而是指乡村里无论何处。可见“东西”与“南北”已整合为一个新的语义，具备明显的语义综合型互文的特征。同一语句中既有互补成分，又有综合成份，这是兼有互补与综合两种类型特征的互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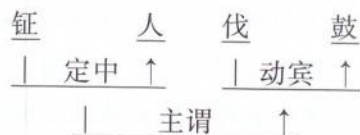
这一类型的互文可能出现的组合方式较少，它们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生态形式、语义和语法结构可以参照语义互补型互文的方法逐层分析。

六 语义矛盾型

这类互文中的两个互补成份在同一语句生态环境中的组合存在语义逻辑上的矛盾。例如，《诗·小雅·采芑》“钲人伐鼓”。

1、结构分析

这个语句只能有一种结构分析：



2、语义分析

孔颖达疏：“《说文》云：‘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说文·人部》：“伐，击也。”钲人，击钲之人。钲人何以伐鼓？费解。就语句层次而言，“钲人伐鼓”在语义构成上存在逻辑矛盾。

3、语境分析

此句在《采芑》第三章，其章云：“鸛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闶闶。”此章描述宣王命方叔南征蛮荆出发前检阅军队的情形。孔疏云：“方叔既临视乃率之以行也，未战之前则陈阅军士。则有钲人击钲以静之，鼓人伐鼓以动之。至于临阵欲战，乃陈师旅誓而告之。以赏罚使之用命，明信之。”¹⁹既是出征前阅兵，气氛必定庄严，所以孔疏云“钲人击钲以静之”。阅兵的目的在于振奋士气，所以孔疏又云“鼓人伐鼓以动之”。“鼓人伐鼓”为后文“伐鼓渊渊”所印证，但在全诗四章中都找不到支持“钲人伐鼓”这一语义构成的证据。

19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426。

4、文化分析

为此得进一步在文化传统方面找原因。《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铙止鼓。”²⁰孔颖达在“伐鼓渊渊，振旅闐闐”下疏：“《大司马》云，鸣铙且却，闻钲而止，是钲以静之。《大司马》又曰，鼓人三鼓，车徒皆作，闻鼓而起，是鼓以动之也。”“凡军进退皆鼓动钲止，非临阵独然。依文在陈师鞠旅之上，是未战时事也。”²¹既然《周礼》以金铙止鼓，则钲人不应伐鼓而应击钲。既然鼓动钲止非临阵独然，则军旅誓师，必然钲鼓齐备，人员各司其职。《采芑》第三章既云“伐鼓渊渊”，则必有“鼓人伐鼓”，钲人岂能越俎代庖？

5、认知意向

“钲人伐鼓”后文是“陈师鞠旅”，则“钲人”、“鼓人”的行为都发生在临阵之前，誓师之时。郑玄笺云：“钲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钲人伐鼓，互言尔。”²²由于文化环境的界定以及“钲人伐鼓”语义构成上的扞格，诱导认知意向朝着分化语句的思路发展。如果充当定语与充当宾语的两个成份相互回避，就可以消除语义逻辑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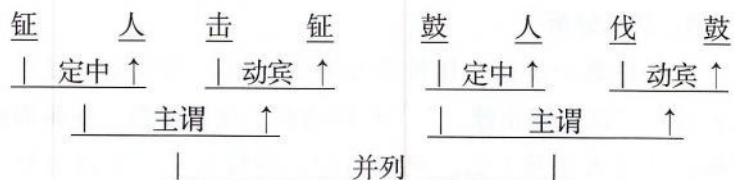
6、组合关系

清理组合关系的结果，原句正常的组合成份与表达形式应当是：

20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721。

21 同上，页426。

22 同上，页426。



换言之，“钲人伐鼓”实质上是一个省略了成份的紧缩复句。它在语义上分述两件事，在结构上则省略了第一分句的谓语和第二分句的主语。可见语义发生矛盾的深层原因并非逻辑失误，省略语句成份过当是造成语义矛盾的主要原因。

结论

以上文例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句法分析的局限，在更为广阔背景下探讨句法结构与语义的相互关系。语句的组合不但在句法结构上有层次性，语句所处的环境也有层次性。人的认知意向、文化因子对互文的语义及结构关系，在不同的环境层次上有不同程度的诱导、制约作用。因此，语言研究不应局限于低层次环境或离开环境作纯形式化的考求。

参考书目

- 〔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 〔宋〕陈彭年等编，《宋本广韵》，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 〔宋〕丁度等编，《集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清〕曹寅、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台北，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77。
-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87。

杨树达编著，《汉文文言修辞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

李国正著，《生态汉语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崔彦）

Ec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Sentences *Huwen* (互文)

Li Guozheng,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Wang Neng-chieh, Taipei Chihl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re are six ecological types in ancient Chinese sentences *Huwen* (互文), including semantic coincidences, semantic complementary, semantic omitted, semantic comprehensive, semantic with two characteristics and semantic conflicts. Any type of sentences *Huwen* (互文)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has a different ecological form and structure of relationship. Not only Sentences in the syntax structure have level-oriented, but also the environmental of sentenc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That, cognitive intent and cultural factors for the sentence *Huwen* (互文) semantic and structural, in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level has different effect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sentences *Huwen* (互文)
ecological types